

修炼好 共产党人的“心学”

新时代党课九讲

罗平汉 著



人民出版社

修炼好 共产党人的“心学”

新时代党课九讲

罗平汉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李 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新时代党课九讲 / 罗平汉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9.6

ISBN 978-7-01-020777-3

I. ①修… II. ①罗…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修养—
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D2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3251 号

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

XIULIAN HAO GONGCHANDANGREN DE XINXUE

——新时代党课九讲

罗平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3.75

字数：178 千字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978-7-01-020777-3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讲	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	1
	——不忘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	
第二讲	补足精神之“钙”	27
	——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	
第三讲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49
	——旗帜鲜明讲政治	
第四讲	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73
	——做实事求是的模范	
第五讲	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10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第六讲	守纪律，讲规矩	123
	——党内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由来	
第七讲	持守共产党人的“戒律”	142
	——严格遵守党内法规	
第八讲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58
	——跟毛泽东学调查研究	
第九讲	怎样看待历史虚无主义	199
	——澄清历史真相，保持高度警惕	

第一讲 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

——不忘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

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就是要求每个党员不忘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体现，也是中国人民优良品质和民族美德的体现，因此，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应当讲党性，都必须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党性修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其意义就在于，在党长期执政情

况下，实现党性修养从“组织自觉”到“个体自觉”的升华转型，既强调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进行集体“修炼”，又注重学习借鉴“心学”的思路办法，教育引导党员从内心深处自觉提纯党性、锤炼德性、塑造人格，真正把党性原则内化为情感意志和自觉行动，强化党性修养内动力，开辟党性修养新路径。

一、从名将陈光的人生经历看党性之重要

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就是锤炼共产党人的党性。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存在一个不断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的问题。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在中共党史上，曾有一位战功赫赫的将领，然而他的人生结局却很悲惨。从这位著名将领的人生经历或者说人生悲剧中，不难看出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讲党性的重要性。这个将领的名字叫陈光。

陈光 1907 年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参加湘南起义，起义失败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1928 年 8 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冒进湘南，由宜章农军编成的 29 团官兵因乡土观念严重，打下湘南重镇郴州后大部分跑回家乡，陈光当时态度很坚定，不但劝阻一些乡亲不要擅自离队回家，而且明确表示：“我陈光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此后，陈光进步很快，曾担任过红四军连长、副支队长、团长、师长，1936 年 12 月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主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陈光任八路军 115 师第 343 旅旅长。1938 年 3 月初，115 师师长林彪在山西隰县以北被阎锡山的军队开枪误伤，只得回延安治

疗，他所担任的师长一职由陈光代理。1939年春，陈光与师政委罗荣桓率115师主力挺进山东，为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全军总共只有3个师，这3个师的师长分别是115师师长林彪，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军衔时，他们3人全被授予元帅军衔。按编制，八路军的每个师下辖两个旅，首任旅长分别是115师第343旅旅长陈光、第344旅旅长徐海东；120师第358旅旅长卢冬生、第359旅旅长陈伯钧；129师第385旅旅长王宏坤、第386旅旅长陈赓。这6个人中，徐海东、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陈伯钧、王宏坤被授予上将军衔，卢冬生1945年12月牺牲于哈尔滨，陈光则在1954年自杀于武汉。

那么，陈光为何在1954年自杀呢？陈光作为高级将领，经历过无数次的大小战斗，功勋卓著，但性格过于刚烈，不善于团结人。1943年3月，陈光调离115师前往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同年10月到达延安。1944年春，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当时，组织上对陈光过去的历史作了充分肯定，党小组在对他的历史进行审查后写道：“陈光同志自农民出身领导游击战争始到现在，已成为我党有数的军事人才之一，亦看出他一贯忠心耿耿，为党为阶级事业虚心学习、联系群众的优良品质。在指挥作战中，机智英勇，曾创造出不少有名战斗范例。”1945年4月下旬，陈光出席了中共七大。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时，由各代表团酝酿提出候选人名单，经山东、山西两个代表团提名，陈光也被列入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之内。他自己也认为凭资历与战功，应当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是，当时毛泽东为了照顾党内各个“山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相继建立若干革命根据地，客观上一个根据地就成为一个“山头”，毛泽东对“山头”的态度是一承认，二照顾，

三消灭。之所以要承认与照顾“山头”，因为没有若干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最后连成一片，就没有后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承认和照顾“山头”的目的，是最终在党内消灭各个“山头”，实现全党的完全统一），在考虑中央委员会组成人选时，希望红一方面军特别是红一军团出身的干部能够有所忍让，以便有更多的名额给其他“山头”出身的干部，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红一军团出身的。因此，在七大正式选举之前，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将陈光从候选人名单中撤了下来，而陈光在这个问题上大局观念不够，也不体谅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公开表示反对，在延安造成了不良影响，毛泽东为此曾亲自写信给他做解释说明工作。

抗战胜利后，为建立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派遣大批干部进入东北，陈光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到东北后不久，陈光即在电台问题上与老领导林彪闹了一次不愉快。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在辽宁的黑山、北镇一带组织第二防线，由陈光负责指挥。这时，罗荣桓把从山东带来的一部电台和相关机要人员转交陈光使用。11月下旬，林彪带领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挥所从山海关撤到辽宁阜新。林彪致电陈光，要求将罗荣桓给他的电台和机要人员调到总部。当时陈光考虑到战争形势紧张，没有电台不便进行联络、指挥，于是回电希望将电台与人员留下。随后，林彪又连发两封电报催调电台，并指责陈光扣压电台妨碍指挥作战，于是陈光决定将电台送往总部。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从锦州、沟帮子向北镇发起大举进攻，电台与机要人员只得随陈光向东转移至吉林盘石，离总部所在地阜新更远了，因而电台最终未能送到总部。1946年1月，陈光调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随后，他又没经过林彪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批准组织长春战役（尽管此役取得了胜利，为了打下长春，陈光

还曾亲自进入长春了解情况，此役共歼灭伪满“铁石部队”两万余人，并占领了长春）。此后，陈光曾任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司令员、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东北军区第一前线指挥所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等职。

1949年4月初，第四野战军在北平朝阳门内的九爷府（孚王府）召开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林彪在会上作《论团结》的报告，重点是反对骄傲自满和加强集体领导，并将陈光作为骄傲的典型点名批评。林彪说，共产党员要懂得点集体主义，不然，永远不用想胜利。共产党员的党德，就是要对对的以支持、拥护。有些小毛病可以马虎，不要在小的东西上斤斤计较，冲淡了大的问题，这就表现了团结的气氛。有些同志就是人家说得对他也说不对。陈光同志就是此类同志，到哪里也难得和人家搞好团结。对于林彪的这个批评，陈光不能接受，当时立即起身离开会场以示不满。

随后，陈光随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1950年1月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可是，他到广州后不久，就未经广东军区主要领导人叶剑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同意，安排一些来投靠他的亲友去做海南岛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并将老家的亲戚和知识青年招来广州办训练班，还派遣一些人去香港活动，做生意。应该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事先不请示主要领导确实不妥。叶剑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曾亲自找陈光谈话，希望他认识和改正错误，但陈光脾气暴烈，又以有战功自居，产生了严重对立情绪，据说最后两人甚至拍了桌子，谈话不欢而散。后来，广东军区召开生活会，继续对陈光进行批评帮助，陈光不但不能接受反而再次拍桌子。

为了严肃党的纪律，1950年7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委报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后，决定给予他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的处

分。随后，陈光被软禁于广州的住所。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动员他迁居武汉，后被隔离居住在中南军区一栋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的楼上。应当说，这个处分确实有些重，当时中央纪委对于陈光的处理还是比较慎重的，曾批复：“现在对他要（么）就是承认错误，决心改正，留在党内继续为党工作；要（么）就是继续错误，自绝于党和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责成华南分局纪委负责处理此事，将上述意见向陈光说明，要求他表明态度。1951年年初，中共中央中南局派人同陈光谈话，劝他认识错误，但陈光认为处分决议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处理不公，并认为这是林彪故意加害于他，因而拒绝接受组织处理。1951年2月，中南局作出《关于批准华南分局开除陈光党籍的决议》，认定陈光“以功臣自居，胡作非为，目空一切”，“断送了他过去的光荣，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道路”，“陈光的错误及其反党行为，已经发展到不可饶恕的程度，继续留在党内，对党对人民是有害的。”正式将其开除党籍。对于这样的处理，陈光自然难以接受，时常狂躁不安，1954年6月，陈光自焚身亡。

1971年林彪事件后，陈光的问题被再次提出。1976年2月和1981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曾两次组成联合复查组，对陈光一案进行复查。1976年2月，复查组得出的结论是陈光错误严重，对他的处理是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未发现对陈光有陷害的问题，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是必要的，但可视为人民内部矛盾。1981年2月，复查组认为陈光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原定的错误性质有些偏高，处分过重，长期隔离的做法欠妥，建议恢复党籍。但是，对于这两份复查报告，中共中央都没有批复。

1986年10月前后，罗荣桓夫人林月琴、罗瑞卿夫人郝治平等16人，联名给中央纪委书记陈云写信，希望对陈光一案再次进行复查。

陈云于同年11月7日批示同意进行复查。随后，中央纪委、中组部和中央军委纪委、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组成调查组，对陈光一案进行复查。1987年9月初，联合复查组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陈光参加革命后，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战勇敢，战功卓著。但个人主义严重，无组织无纪律。原来认定的错误事实，大部属实，部分失实；原来对错误的定性过高，给予的处分过重；建议恢复党籍，恢复原职务待遇。1988年1月，中央纪委常委会一致同意复查组关于陈光案件的复查报告。^①1988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于中央同意撤销陈光反党结论的函件》，其中说：“对陈光同志的问题，经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军委纪委联合复查审议后，向中央报了《中央纪委关于陈光同志问题复查处理意见的请示》。中央同意撤销原定陈光‘反党的结论’，恢复陈光同志的党籍。”

陈光在战争年代转战南北，10次负伤，功勋卓著，曾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最后成了悲剧式的人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尽管恢复了党籍与名誉，他毕竟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自然，当年对于陈光的处理有些过重，但林彪事件后对陈光案件的几次复查都认为他本人确实有不足，存在个人主义和纪律观念不强等问题。如果陈光当时处理相关问题的时候不那么冲动，纪律观念、大局意识更强些，党性修养更好些，这样的人生悲剧是否可能避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员的党性不一定会随着党龄的增长而增强、随着职务的升迁而提高。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自觉讲党性，努力提高党

^① 李惠仁：《沧桑流年——一个中纪委委员的自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303页。

性修养，于党、于己、于家庭都是有益而无害的。

二、党史上第一份关于党性问题的专题文件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党性”一词在1941年之前很少出现，而在1941年之后则成为热门话题，原因就在于这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今天重读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或许对于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增强党性，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增强党性，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事情还得从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说起。这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包括其军部在内九千余人，奉命从驻地泾县云岭向长江以北转移，1月6日，在途经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激战7昼夜之后，终因寡不敌众，仅有两千余人突围，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项英名义上虽只是新四军副军长，但他在党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而军长叶挺不是中共党员，所以项英实际上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工人出身的高级干部，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之后，一开始，王明等人对项英并不满意，但项英很快对王明等人采取合作的态度，成为王明路线的支持者。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项英留下坚持游击战争。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明从莫斯科回国，曾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项英受其影响较深，甚至到1938年10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他仍然表示：“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

经过统一战线，反过来，工作就不能发展”^①。加之项英在坚持三年南方游击战争中，很长时间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联系，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既得不到中央的及时指示也无法及时向中央直接汇报，这种工作环境难免对项英产生影响，以致重大问题不向中央及时请示汇报，对中央的重要决定也不及时贯彻落实。因而抗战爆发后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贯彻措施不力”^②，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没有足够的警惕，从而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重大损失。

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局势与对策，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项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作为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在此问题上“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更为严重的是，“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③今天看来，皖南事变造成如此严重后果，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复杂，项英作为中共在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尽管批评其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

① 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30页。

③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党”有些言重，但在抗战爆发后对蒋介石可能进行的反共活动没有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中央的指示贯彻不那么及时却是事实。

中共中央认为，项英之所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根本上是党性出了问题，因而，中共中央在《关于项英错误的决定》中强调：“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象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①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项英、袁国平“不服从中央领导”以致造成皖南事变的严重后果，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因此，加强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党性，对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持长期抗战就显得特别重要。

为增强全党对于党性问题的认识，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此进行专题讨论。

这次会议上，王稼祥作了关于党性问题的报告，主要分析“党内独立主义的错误”的表现、危害及纠正办法。报告列举了“党内独立主义”的具体表现：在政治上，不能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指示；在军事上，为不服从命令、自由行动；在组织上，合自己口味的就是好干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4页。

部，不合的就不是好干部，本位主义争夺干部，保存干部，或者要求直属中央，达到自主的目的。报告指出，“党内独立主义”将由对上级的阳奉阴违发展到对抗上级，最后到事业的失败，而且其首领愈大则危险性愈大，力量愈大则危险性愈大。报告认为，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小商品生产状态，而中共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的情况下，各个根据地又长期处于被分割状态，加上上级对下级某些干部批评教育不够及某些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是这种“党内独立主义”滋长的重要根源。要纠正这种“党内独立主义”，必须提出这种倾向的来源与危险并进行党内教育，注意这个问题的及时纠正，不能纵容某些干部的错误，上级要严格检查下级对决定的执行情况，正确规定集中与分散的原则并具体规定哪些问题应集中或分散，“实行中央集权”，“实行铁的纪律，对犯错误的干部必须实行纪律与组织的制裁”^①。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对中级以上的干部进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过宽的方面发展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②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中央提出党性问题，是从项英事件开始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同时党也扩大了，政治影响也大了，所以中央特别提出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强调指出违反党性这个问题的危险

① 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性，并提起全党注意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努力克服这种倾向。英雄主义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自由主义、损人利己、个人突出、喜欢人家拍马屁等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不看到这一点，自己是不会进步的。实行自我批评，是要干部自己实行自我批评，同时党也要帮助他改正错误。要看到自己的弱点，要注意与自己的弱点斗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正自己的缺点。^①

陈云在发言中表示：关于党性问题，下层虽有违反党性的，但头子愈大，危险愈大，军队愈多，危险愈多。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个人利益仅仅包含在党的利益中。个人主义是个人利益超过党的利益，除党的利益外还有个人的企图。对人家是打击，对自己是抬上，对上下级是副官的态度。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是有矛盾的，但个人利益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前提。所谓有原则性，就是要看他个人利益是否能服从党的利益。党员与非党员的区别，就在于党员是为了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党龄愈长，个人主义思想就应愈少。每个党员都要提高自觉性，与自己的错误倾向作斗争。^②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负责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王稼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同王若飞合作，写出了决定的初稿。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20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党面前的仍然是伟

① 《张闻天文集》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29页。

② 《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323页。

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整体。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分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的这些倾向，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

《决定》指出，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二是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治，只要求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三是在思想意识上，用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